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书林五味

金恩晖◎著

上海科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书林五味

金恩晖◎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林五味 / 金恩晖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ISBN 978-7-5439-7328-2

I. ① 书… II. ① 金… III. ① 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5616 号

责任编辑: 胡欣轩 王茗斐

封面设计: 许 菲

丛书名: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书 名: 书林五味

金恩晖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30 000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7328-2

定 价: 25.00 元

<http://www.sstlp.com>

书香致远的专业人生

——一个北大图书馆学学长的书文化之路（序）

徐 雁

（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

前年金秋的一天，应长春图书馆邀请，我去到素有“北国春城”之称的吉林省省会，为“2015年长春市市民读书节”做了一场题为《最是书香能致远——读物选择与幸福追求》的阅读推广讲座。讲座之暇的一个幸福收获是，在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秦亚欧兄的陪同下，看望了阔别多年的北大学长金恩晖先生，并为《全民阅读书香文丛》第四辑，组约了一部他老人家的读书随笔集。因此之故，金学长旧言重提，执意命我要为他这部《书林五味》写一篇序言。

不由得想到当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求学期间，与金大学长结缘的往事。

那是我在三年级前后的光景。1982年秋，我与王德胜、邱明斤、陈国锋（致成）、姚伯岳等同窗好友一起，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学生学术社团——学海社，以继

承、弘扬和钻研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蒙著名学者王力先生担任学术顾问，并赐书《七律·题学海社》墨宝。其中“骋怀学海扬帆远，游目书林用力勤”一联，遂为我和本社社员、社友的励志之语，传诵至今。

学海社的社刊《学海》主编，则聘请了高我们一个年级的王余光同学来担任。王学长做过本系学生学术刊物《初读》的主编，他来担纲《学海》编政之后，敬业乐业，其中的一桩功德，便是他主编的《学海》某期的一组社员文章，被吉林省图书馆编印的《图书馆学研究》录用了。这给予新生的学海社以极大的信心鼓舞和热情激励。当文章刊登出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主持《图书馆学研究》编政的金恩晖学长大力提携的结果，他为母校能有好学勤写的后来者感到由衷地高兴，并寄予厚望。记得在1984年我大学毕业的那个春天，该刊还及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篇投稿文章《中国古代典藏保护技术述略》，从而坚定了我毕业后继续从事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的专业决心。

有此因缘，原本遥不可及的大学长，便与我这个小学弟建立了友情上的联系。1984年夏毕业后，我先在国家教委（教育部）机关做小公务员，五年后调动到了南京大学，先后在校出版社、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和信息管理系（学院）工作，尽管空间距离加大了，但始终与他保持着声气相通、心迹相印的忘年交关系，情与谊与

时俱进，因年而笃。但世事难料，随后就有了一桩书林事故的发生。

且录我保存下来的 1998 年 5 月 2 日的一札，以见其事原委吧。且略引数段文字如下：

感谢您给我的这个出书机会。自看到《华夏书香丛书》目录后，我即按您们的要求，努力去做……最近北大校庆 100 年，搞得风风火火，成绩方面粗线条谈的很多，但北大的历史教训亦应认真总结，引以为鉴。比如，“文革”初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十年动乱，“两校”（即“梁效”笔名之谐音——引用者注）文章满天飞，“批林批孔批周公”等等。从深层次看，这同“文革”前 20 年的僵化教育有直接关系……这一代从 50—60 年代接受的是教条主义，“左倾”思潮下的僵化教育，传统文化基础薄，底子浅，又未能与世界新潮流同步，50—60 年代的大学生如此，“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只有少数经过“补课”、“回炉”有所成就，也未必都出在北大。如是，至少在人文领域，现今的北大，又怎敢侈谈其“大”！？当然，责任不在我们，而是历史之使然。难道不应该总结一下北大发展史上那些背离了“五四”科学与民主传统、背离了蔡元培校长兼容并蓄精神的教训么？

我诚恳地想请您为我这本小书写一篇同系学友式（而不是来信中的“金老师”的师生式）的序言，更不希望您在序言中有任何溢美，或捧场之词（时下人们对书评界此风，大有反感）。请您从我们这一代北大毕业生经历的上述大背景上，为我画一画像，总结一些教训，认真地指出我的严重不足，缺点和问题等等。大体上讲，我还算勤奋，知识面较广（我认为，我们系，乃至整个文科系，应有一“大文化”概念），各种人文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皆是相通的）。但先天不足，国学根底浅，外文只粗通俄文，对中国古典文化继承不够，对世界思潮长期封闭，只是七十年代以后，国门大开，才总算跟上了一点形势……我希望您在我这本书序言中，应指出我这种不足，起到对我们这一代人学术上总结的作用。字数、内容，随您兴之所至，任意去写。

书信开头所说的那套《华夏书香丛书》，1998年9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因故未能如愿组稿出版第二辑，因此，所谓“同系学友式”的序言自然也就成为无本之木了，也就无从说起了。此事让我抱憾甚深，歉疚的心情久久难以抚平，但性情爽朗的大学长却宽容之极，从未因此未竟书事而责难于我。如此说来，正在写作进行时的这篇文章，真是一篇延迟已太久的序

言了。

话说金大学长出生于 1938 年的吉林市。1957 年夏，由吉林省实验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1 年本科毕业后，被组织上分配至吉林省图书馆工作。历经俄文图书分类编目、中国古旧书采购与分编、参考咨询和辅导等岗位，于 1984 年起任副馆长，1996 年担任馆长。限于我国长期缺失《图书馆法》的具体国情，他是为数不多的终成“正果”的图书馆专业工作者，即能集馆长、研究馆员于一身者。

不仅如此，他还是业内外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地方文献研究专家。原因是大学长少小早慧，在其学生时代，即爱好文学阅读和写作。无论是在课余、还是在后来的业余时间，他勤奋撰写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杂文和美学随笔，及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在当日颇有影响。1980 年，他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成为了会员，随后还担任过吉林省作家协会理事等，并先后被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吉林大学中文系聘请为兼职教授。

依据扎实的图书文献学知识和图书馆信息咨询的专业背景，大学长在图书文献学、地方史志等多个领域有所建树，成果斐然。累计发表文章约四百篇，出自他笔下的《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王重民先生敬业精神对学生的感染》《学者的品德、友谊和骨气——兼谈王重民先生和金毓黼先生的君子之交》《坐

拥书城四十载，事业学问皆楷模——集读者、馆长和学者于一身的杨威理先生》《记我国台湾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王振鹄先生》《飞出榆关架“热线”，探幽书山铸新篇——记台湾著名图书馆学家胡述兆博士》等篇，尤能给人以思如泉涌、文不加点的深刻印象，这是因为在写作中，大学长融合了他的学识之厚，发挥了他的文笔之长，因此，其笔下文字的知识性和可读性都很强。至于荟萃了其专业立言的代表作《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选》，由他领衔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等近三十种书籍，早已被各级各类图书馆所收藏，已经或正在发挥其应有的文化学术贡献。

本书得以成编，得到了他的弟子秦亚欧兄的全力助理。全书文稿被他悉心编纂为上、中、下三辑，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一个科班出身的图书馆学者，在长达一个甲子的人生道路上，管书、用书、编书、读书和写书的心路历程。我相信大学长这一段在书林学海里五味杂陈的心路历程，给予后来者的种种启迪，将是十分深刻而富有教益的。是为序。丁酉年雨水节后六日，于金陵江淮雁斋。

目 录

上辑 读书求学

走进人生即读书	
——回忆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	1
最忆魁星楼	
——小学同窗共忆母校实验小学	13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祝《花溪》创刊号	25
又见《向阳草》	27
纪念刘国钧教授逝世 30 周年	
——忆起五十余年前的往事	32
王重民教授使我喜爱上方志	4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见手迹，念母亲	53
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交流之我见我思	59
读书治学应如“掘井及泉”和“跑马占荒”	
——来新夏教授曾对我如是说	64

中辑 良师益友

深切地怀念 沉痛地追思	
——纪念唐西民馆长九十周年诞辰	70

直掳血性为文章

——缅怀宋振庭同志

93

“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杨殿珣评传·附〈清代金石著述
录目〉》序

96

周金冠和他所编订的《沈尹默先生佚诗集》

106

“光岳藏书楼”参观后记

118

师生之情，难忘永怀！

122

“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往时”

——《图书馆学引论》忝列图书馆学文库
引起的感想

125

记美国友人福森博士

135

乡梓情结使我与旧志整理、新志编纂工作结缘

——应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 30 周年
纪念文集约稿作

143

下辑 前言后语

读王子舟教授新著《图书馆学是什么》

153

刘宝瑞校友新著《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

序跋辑要》评析

163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 年前）》序

167

凭吊古迹

——兼读玄烨《经叶赫废城》等诗有感

176

从史籍研究和考古调查的比较参照中认识前郭 的历史	
——张静岩著《前郭尔罗斯史地研究》序	184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金延龄著《集安史话》序言	195
雾夜里的红星	199
“平生我如拆袜线，老来要认本来面”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 研究》后记	202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后记）	216

| 上辑 读书求学 |

走进人生即读书

——回忆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

我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姑父母四人当时在日本留学，其间父亲和姑父因“反满抗日罪”被日本宪兵逮捕，严酷的刑罚并没有使他们屈服，因而被关押近4年之久。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吉林市的祖母身边，由她抚养长大。祖父是清末的秀才，平生之志未得施展，他虽然早逝，却留给家里人很多书籍。我识字较早、较多，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像冰心的《寄小读者》等“五四”以来新作家的作品、《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我都曾囫圇吞枣地找来阅读，从很小的年纪就喜爱上了文学。

1948年，吉林解放，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我的父亲因在1946—1948年间任国民党时期吉林日报社主笔

等伪职而成了反革命，1950年病故。我于1951年由吉林省实验小学毕业，被保送入吉林省实验中学读书。在中、小学时代，由于共产党、青年团、少先队的教育，我开始划清了“谁养活谁”（同剥削阶级家庭）的界线，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同有历史问题的父亲）的界线。新中国成立初，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并不因我的家庭出身和父亲的问题而歧视我，我的各方面表现一直很好。当时中学实行5分制，每学期结束时，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各门功课皆评为5分的学生，授予“最优等生”奖章。在吉林省实验中学学习的12个学期中，我获得过11枚“最优等生”奖章。

读中学的6年间，我都住在学生宿舍。每天除三餐外，早操、上课、午睡、文体活动、早晚自习，都很有规律，也很严格，各门功课学习起来并不费力，几乎每年都担当学习委员或班长的职务，但还感到有用不完的精力，从初一起，我就成了校图书室里最积极的小读者。课堂上灌输的知识满足不了我的求知需求，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图书室读书看报。这是我课堂之外、活动之外的最好去处。校图书室也有闭馆的时候，我还感到不满足，就在担任班长的同时，抢着兼任了班级的图书员。这样一来，我得以隔一段时间，将从班级收上来的几十本书，抱着还给校图书室，又从图书室替同学选择，借回一批书。在这“一还一借”之间，就比别的同

学多读了许多课外书。课外书读多了，学习起课堂的知识就尝到了甜头。有些同学对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课听不太懂或难于理解，而这对经常读课外书的同学来说，就很容易理解，老师一点就透，不仅理解得深，还记忆得好，乃至发挥起来全不费力。每当中期、期末考试乃至初、高中毕业的升学考试，我都没有废寝忘食、苦熬硬拼，除了外语单词等少数功课外，我几乎用不着夜以继日地去死记硬背，即使像历史、地理这样的功课，因为课外书读得多，考试成绩也很好。我想这就是读书中的厚积薄发、举一反三的道理吧。

1954年秋，我初中毕业，考入本校高中部。吉林省省会这时由吉林市迁到长春市，翌年我们的中学也随之迁到了长春。高中时代，在语文组老师们和《长春日报》文艺部编辑指导下，我们这些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起吉林省实验中学青少年作家协会，由学校出资，我和李显忠等几位同学组成《向阳草》编委会，出版了两期。这是当时吉林省中学生自己创办的唯一一种铅印刊物。从刊物的邀稿、审稿、改稿、编稿，到校对、付排、印刷、发行，都是我们这些小编者自己做。几乎所有可能利用的课外活动时间，我都用在了图书室。为办刊物，就要多读书刊，读得越多，就越有一种创作的欲望。我开始将一些杂文、诗歌向省内外报刊投稿，其中有的陆续地在《长春》《文学青年》《辽宁文艺》《长春日

报》上发表了。记得在高二时写的一篇短评发表在《读书月报》1956年第10期上，这可能是我正式问世的处女作。在课外阅读基础上产生的创作欲望，大大地提高了我的理解力、思考力和创造力。中学时代我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每当我在学习和创作中，或者在社会上遇到任何疑难和困惑的问题时，首先想到应该到图书室里去，不论怎样忙也要挤时间，自己在那儿查书、找报，以求解决。

记得也是高二时，我在阅读某期文艺杂志后，对文艺理论上某一观点产生了不同看法，带着也要发表一点自己意见的想法，到校图书室，几乎翻遍了有关的文艺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经过对较多资料的搜集、综合、分析、研究，摩挲探讨，坚信了自己的观点，用了三个晚自习和一个周日时间，写出了一篇4000多字的文学评论文章，不久，这篇题为《诗人啊，从生活中站出来》的论文，发表在《北方》文艺杂志1957年5月号上。高中时代，我的读书兴趣和写作欲望与日俱增，更感到课内课外学习都离不开图书室。又认识到光读不写，只进不出是无所作为的；读一些书，想一些问题，有一点新见解，就要写出来，争取发表，走向社会。读书，可以加深对已有知识的理解并增加许多新知识，产生写作的要求；带着某种问题去读书，为了写作的需要去读书，围绕某一主题广泛浏览、深入发掘，又会进一

步增加阅读兴趣，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而无论是为了写作而读书，还是为了读书而写作，图书室都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中学里的一个小小的校图书室，使我走进人生即读书。这就是1957年高中毕业后我报考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原因。

1957年9月，我以十分兴奋而紧张的心情到北京大学报到。从这时起，我的命运和道路就更牢固地同图书馆联系到了一起，因为我考上了图书馆学系。我天真地憧憬着：一生要做一个读书人；又执著地相信：读书人唯一的惯性需要就是读书与写作；我念上了图书馆学系，毕业后就工作在图书馆，因之也会永远方便地去读图书馆中所有的书、去写自己想要写的文章了，我觉得自己选择了一个十分理想的专业。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一个人的本职工作是图书馆同利用图书馆的藏书为自己服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如处理不好，动机和效果会适得其反。再从我入北大当时的政治气氛和自此以后我国教育、文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来看，我的想法也未免太天真、太不切实际了。

1957年春、夏季之间，也就是在我秋季入学北大的上一个学期，学校已围绕着党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整风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揭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序幕。我们这批一年级新同学，一入学就被组织起来，